

论两汉易学的形成、源流及其特征

林忠军

(山东大学 易学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本文详细地阐明了两汉易学形成的原因、学派及其特征。指出政治上的需要、统治者的扶植和功利所使是两汉象数易学产生的外因,易学发展的需求是其内因。从其渊源言之,两汉易学传自田何,田何传自孔子。经田何几传,汉初形成了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加上民间费、高两家,共六家,其中孟、京两家易学是其主流。东汉易学师承西汉,以费氏易为主。两汉易学有四大特点,即笃守师说,崇尚象数,资取科学,杂糅神学,这四点与其它时期的易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学术上利弊也极为明显。

关键词:两汉;象数;易学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0)01-0023-06

On the Formation,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an Commentaries on Zhouyi

LIN Zhongjun

(Research Center of Zhouyi,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 The causes of formation , schools of though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es on I-CHING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are expounded in details in the essay. It is also pointed out that it was the political needs, The rulers' support and the pursue of material gain that brought about Xiang Shu Yi Xue (literally, researches on I-CHING of the Symbol & number school), as its external cause, and the demand for development as its internal cause. As for its origin, The study of I-Ching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came from Tianhe, who inherited I-CHING from Confucius, and then passed on to Shi, Meng, Liangqiu and Jing Fang as well as Fei and Gao schools among the people, altogether six families. Being disciples of the Western Han's scholars, the East Han scholars on I-CHING continued its study with Fei's style as its representative. There are four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about the study of I-Ching in two Han Dynasties. They are sticking to the original, upholding Xiang Shu, absorbing scientific materials and mixing with theology. These form the sharp contrast with other periods. And the advantages and

收稿日期:1999-8-30

作者简介:林忠军(1960-),男,山东莱阳人,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disadvantages of systematic learning were also much obvious.

Key words: Han Dynasties; Xiang-shu; school Zhouyi

一

西汉已降,社会经济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央集权制日趋完善,统治者为了巩固已取得的经济和政治的巨大成就,建立了适应社会需要的大一统经学文化。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定儒家为一尊,并采取系列相应的措施,如建太学,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经学成为时人晋身入仕的阶梯。武帝之后的其他帝王纷纷效法。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宣帝在石渠阁“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尺度。光武帝爱好经术,广泛收集图书,修建太学,立五经博士,从而使天下四方学士云集京师教授经学。明帝即位,亲行飨射礼,礼毕正坐讲经,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又为功臣、外戚子孙另立校舍,挑选高能,以授其业。章帝效法西汉宣帝开展对经学讨论,“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1](《后汉书·儒林列传序》)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用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1](《后汉书·儒林列传序》)由于政治上的需求和功利所使,研习经学,蔚成风气,经学达到空前的繁荣,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经学文化。《汉书·儒林传》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线也。”“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是对当时经学繁荣的真实写照。皮锡瑞把经学的发展和繁荣归结为两个原因:一学经可以做官,即汉初仕不任儒,武帝始任公孙弘为丞相,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元、成、光武、明、章袭之,宰相公卿之位,未有不用读经者。一是大力扶植经学教授。武帝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昭帝增百人,宣帝倍增之,元帝设员千人,成帝增三千人,汉末太学诸生至三万人。此分析应该说合乎当时实际情况。两汉易学作为经学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得以产生和发展的。

同时,易学有其独特的概念、思想内容、符号体系、思维方式和筮占功能,在其发展中表现出其特殊性,而与其他经学区别开来。也就是说,易学按照自己的特有的规律发展演变。由此观之,两汉象数易学的形成和发展,除了社会的原因外,还有其内在的原因。《周易》本为卜筮之学,它成书于殷末周初,当时神学巫术盛行,有梦占、星占、石占、龟占、草占等,民族文化风俗的差异,其使用的占卜方法也各不同。如司马迁所言:“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2](《史记·太史公自序》)“蛮夷氏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2](《史记·龟策列传》)当各种粗俗的、简单的占卜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时,优于诸种占卜的《周易》筮占应运而生。然经过孔子及后学的整理和解说,《周易》被赋予了浓厚的儒家思想,即《周易》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具有了二重性:一它仍然具有筮占的功能,是一部卜筮的书;一是在神秘筮占的外壳下蕴涵着深刻而丰富的哲理,又是一部哲学典籍。从而《周易》成为一部兼顾“学”“术”、融象数理占为一体的著作。就学而言,孔子及后学虽然提出了象数义理兼顾的注《易》模式,但还缺乏系统的论证和详细的解说,尤其是对作为易学本原的象数,只视其为从属于义理之学的一种治《易》方法,还没有从概念、内容、方法等方面作以严格的界定和深入的阐发,未把象数和义理视为两个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治《易》方法,更未真正上升到“观象系辞”的高度,以象数为工具,揭示象辞之间的内在联系。易学的发展迫切需要由浅入深、由抽象到具体、全面系统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就术而言,《周易》的大演筮法虽然要比龟卜等要精致得多,高明得多,尤其经孔子儒家的诠释,貌视严密。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类思维的提高,其破绽日益显露,这就急需对《周易》筮法进行改革,创立更加完善的、更加适用的筮法。因此,两汉象数易学的产生,是易学发展的产物。

二

汉代习《易》方式是师承,口传心授。据史书记载,汉代易学传自孔子,经孔子几传而至汉代,形

成了官方四大家,加上民间两家,共六大家。《汉书·儒林传》云:“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骅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称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成阳相。光川孟但,为太子们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川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后汉书·儒林列传》对《汉书》中所记载的传易师承关系、学派作了更为简明的概括和补充:“田何传《易》授丁宽,丁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仇、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又东郡京房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又有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又沛人高相传《易》,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为高氏学。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费高二家未得立。”若以治《易》方法言之,西汉易学可分为四大派:“曰训诂举大义,周服等是也;曰阴阳灾变,孟、京等是也;曰章句师说,施、孟、梁丘、京博士之学是也;曰象象释经,费、高是也。”^[3]

其中以言阴阳灾异的孟京一派,因专言象数,并借助于象数大谈阴阳灾异,与汉代以齐学为主的天人之际相吻合,而成为汉代易学的主流。易学家们站在时代前列,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和易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建立了以推天道、明人事的象数筮占体系,从而改变了易学发展的大方向,易学研究总体上走上了以象数治《易》的道路。这一易学史上重大变革始于孟喜,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而改变师法,提出了卦气说。焦延寿得“隐士之说”,且“尝从孟喜问《易》”,发展了孟喜的思想,擅长占验。京房受《易》于焦延寿,建立了以占验为内容的庞大的象数思想体系,言八宫、纳甲、世魂、飞伏、五行等,于象数多有发明,故其说虽祖田何,却为田何易之异党。京氏易的形成,标志着汉代易学变革的完成。清人皮锡瑞评论说:“战国诸子及汉初诸儒言《易》,亦皆切人事,而不主阴阳灾变,至孟京出而说始异。”^[4]又说:“首改师法,不出于田何、杨叔、丁将军者,始于孟而成于京。”(同上)被称为“内学”的《易纬》是汉代象数易学的重要著作,它以通论的形式,一方面对《周易》的性质、起源、卦爻结构、易数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另一方面又继承了孟喜、京房的思想,对卦气、爻辰、易数加以整合,从而总结和升华了西汉象数易学。

就易学渊源而言,东汉师承西汉,西汉施、孟、梁丘、京氏和费、高易学成为东汉易学的正宗,学人传授不绝。据《后汉书》记载,传施仇易者有戴宾、刘昆,传孟喜易者有注丹、颍阳鸿、任安、虞翻等,传梁丘贺易者有范升、杨政、张兴等,传京房易者有戴凭、魏满、孙期等,传费直易者有陈元、郑众、马融等。其中以《易传》释《易》的费氏易成为易学的主流,并逐渐取代了其它易学。《后汉书·儒林列传》云:“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受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

东汉易学虽原于西汉,是西汉易学的延续和拓展,但又有明显的区别。从传《易》的方式言之,两汉易学讲究师承,注重师法家法。所谓师法家法是传授易学所形成的门派观念。“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师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5](P.136)}由于东汉易学是对西汉易学解读和阐发,二者是源流的关系,故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从《易》的版本言之,两汉易学有今文、古文之分。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体书写的易本为今文本,用篆体书写的易本为古文本。今文古文内容无大差别,“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惟费氏经与古文同。”^{[6](《汉书·艺文志》)}西汉施、孟、梁丘、京是今文易,费氏易是古文易,故西汉以今文易为主,东汉以古文易为主。从易学表现形式言之,西汉易学明大义微言,尤重占验,其易学是当时天人之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孟喜卦气说,焦氏《易林》四千零九十六卦,京氏八宫、世应、纳支等,《易纬》爻辰,皆为占验而发,故西汉象数易学思想是通过建立筮占体系而表现出来的。而东汉易学多章句训诂,以象数为据,揭证易义。易学家为了寻找象和辞之间的联系,绞尽脑汁,借用和发明互体、卦变、升降、爻辰、卦气、之正、爻位等取象,因此,东汉易学象数思想是通过注经表现出来的。如郑玄作《易注》、荀爽作《易传》、宋衷作《周易注》、虞翻作《周易注》,皆阐发了各自的易学象数思想。

由于易学与其他思想一样,其发展总是与时代进程相联系,即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吸收当时一定的文化科技成果,适应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的需要而建立。因而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研究主题、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思想内容。与其他易学思想相比,两汉象数易学有着以下几个不同的特点:

(一)笃守师说

如前所言,两汉易学传授方式是师师相承,前后相因。在传《易》、习《易》过程中,这种由于师承而形成的师法家法极为森严,各家各派,必须严格按照自己的宗师说治《易》,不得越雷池一步,甚至连一个字也不得改,更不得参杂异说,以保证这个学统的严肃性、权威性和连续性,如皮锡瑞所言:“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子所受,一字母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5](P.77)}若有背师说者,则会受到本派的排斥和整个社会的歧视。如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其师因生死传之,遭到同门梁丘贺极力反驳。当时,“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6](《汉书·儒林传》)}京氏受《易》于梁人焦延寿,而托之孟喜,孟喜弟子不肯。虽立博士,“辄寔见废”。费直传古文易,“元有本师,而多反异”,故东汉初有人提出立费氏为博士时,立刻遭到范升等人的反对而未成。^{[1](《后汉书·范升列传》)}东汉光武帝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安帝又“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仇校家法”。^{[1](《后汉书·蔡伦列传》)}这说明了家法在东汉易学乃至整个经学传授和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法。这种重师法家法、笃守师说的风气,貌似严肃严谨,以一贯统,纯而不杂。其实,他们所传授的早已不是经文的原义,所笃守的也不是早期经师的易说,而是经过自己的业师解读和整合赋予了一定己见的经文及与经文相关的经意和思想。对于这一点,范晔曾这样描述道:“汉兴,诸儒颇修执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1](《后汉书·郑玄列传》)}应当说,两汉象数易学注重师承,恪守师说,有利于易学乃至经学的承传和发展。中国易学尊重传统,崇拜权威,继往开来,代代相传,层层积淀,形成了一种深沉的、凝重的、博大的文化之流,与汉代易学重师承、守师说是分不开的。然过于重师承、守师说,则又往往表现出泥古、僵化的学风。这就四库馆臣所谓的“其学笃谨严,及其弊也拘”。^{[7](《卷一·经部总叙》)}两汉易学重师承、笃守师说与两宋易学不重师承、疑经改经有着明显的不同。

(二)崇尚象数

汉学治经最大的特点是重名物训诂,以探求经文的本义为指归。基于此,汉学家旁征博引,分文析义,考辨异同,力求一言一事,必有其征,表现出朴实、严谨之学风。清末杭辛斋曾就汉学这个特点总结道:“汉学重名物,重训诂,一字一义,辨析异同,不惮参伍考订,以求其本之所自,意之所当。”^{[8](卷一)}汉学这个特点表现在易学上,则专以象数为工具,考释和揭证《周易》卦爻辞。按照《易传》的解释,《周易》是“观象系辞”而成书,即先有卦爻象,后有卦爻辞,卦爻辞是本卦爻象而作。汉儒以此为据,专崇象数,探求其卦爻辞与卦爻象的内在联系,其旨是以象融通《周易》经文和甚至传文,证明易辞一字一句非圣人随意而作,皆本于象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汉儒则以《易传》中象数为最基本的工具,对易辞加以诠释。若象之不足,或根据《易传》现成的八卦之象引申推演,以增加象的数量,即所谓的“以象生象”;或在取象方法上下功夫,即为了得到《易传》某种象,不断地改变取象的方法,如互体法、卦变法、纳甲法、爻辰法、升降法、旁通法、爻体法、消息法等皆是取象常用的方法,如王弼所言“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9]。即所谓的“象外生象”。若数之不足,则又取五行之数、九宫之数、纳甲之数、历律之数等,即求数于《易》外。象数易学从字句入手,明训诂,崇象数,以象数证易辞,还《易》之本

原,合乎《易》作者之意,为后人注《易》指明了方向。然象数易夸大了象数的作用,专崇象数,以象生象,象外生象,以数演数,失之牵合。尤其是它只注重字句和象数,而忽略了易学中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一以贯之的哲理,故其学显得机械、烦琐。这就是四库官臣所谓的“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7](卷一·经部总叙)显然,这与宋元时期注重思想性、思辩性的义理之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 资取科学

从理论形态上言之,象数易学是两汉自然科学与易学相结合的产物,它吸收了当时天文、历法、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建立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易学体系。众所周知,汉代的自然科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天文学方面已发明了测量天体的浑天仪、候风仪和地动仪,能求出二十八宿的位置,测量天象的变化。在历法方面有了专门的历法书,且日趋向完善,如《颛顼历》、《太初历》、《乾象历》是汉代非常完善的历法。这些历书,根据日月运行,能够准确地推算出一年中的节气、月份、天数及闰月。在数学方面,《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已成书,表明了当时数学计算非常娴熟和精确,这就为象数易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孟、京变革易学从学术上讲,不在于筮占,而在于其象数易学体系中参杂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孟喜的卦气说本于历法,即将历法引进易学,按照一定的规律,把《周易》卦爻配上四时、十二月、二十节气、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从而形成了融《周易》与历法为一体的易学理论。京氏的纳甲体系是将历法中的干支和天文学中的二十八宿纳入易卦,并配以五行。又则取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相加解释“大衍之数五十”,这说明了其象数易学是建立在天文、历法、数学基础之上。东汉郑玄的爻辰说,则是将历法中的地支纳入《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并配以星象和音律。集两汉象数易学之大成者虞翻的纳甲说,来自道家的炼丹术(炼外丹是中国古代的化学),它借助于月体盈虚消长变化之象比附八卦,视二者为一体,此为象数易学取自然科学整合易学的重要例证。正是因为象数易学引进了中国古代科技,故从理论形态看它是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与魏晋玄学易、两宋义理之学以阐发《周易》自然社会人生之道为主的人文哲学区别开来。两汉象数易学取自然科学作为建立其体系的基础,以科学印证易学,客观上推动了易学走上了科学、理性的轨道,冲淡了易学中神学成分。同时,作为自然哲学的象数易学又反过来指导和推动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如象数易学运用到历法中建立了具有易学特色的中国历法,运用到中医中形成具有易学特征的中医理论。这一些应当予以肯定,然而由易学与科学结合而建立的象数易学存有诸多牵强之处。

(四) 杂糅神学

两汉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需要强化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特别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来巩固和调整新建立的封建秩序。一方面,统治阶级寻求的是一种时人能够接受的、具有很强说服力的思想,为新建立的王权和封建等级制作论证,以保证其绝对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为了封建社会长治久安,这种思想又不能无限地夸大君王的权力和纵恣失德之君,即它必须对君王的行为有匡正的作用。适应了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神学在两汉开始盛行,并与新确立的经学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神秘色彩的天人之学,这种天人之学由董仲舒发其端,很快蔓延开来,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经学思潮。《汉书·五行志》云:“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云:“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就易学而言,《周易》本为卜筮之学,是神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汉代董仲舒大力推行阴阳灾异,易学近水楼台,以其独特思维方式论证了天人相合一、相通、感应,再次凸显了《周易》所固有的神秘性,成为当时天人之学中的显学和统治者神道设教的重要工具。因此,两汉易学是与神学混杂的经学。两汉易学家除了以象数注经外,皆通晓筮法,精于筮占。象数易学开创者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将天文历法与易学结合,创造了卦气说。虽然史书没有关于孟喜用卦气

占验的记载,但从他与京房合写的《灾异孟氏京房》著作和后世运用卦气占验事例看,孟氏通筮法。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6](《汉书·京房传》)为了改革筮法,他还作《易林》。京房师从焦氏,曾作《易传》、《周易占》、《周易妖占》、《周易飞候》、《周易逆刺占灾异》等,并创立纳甲筮法,最大限度地改进和完善了春秋以来的筮法,据说,他“言灾异,未尝不中”。东汉荀爽在用五行和易学论证汉代存在的合理性时,夹杂着神秘的天人之学。他说:“汉代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其象在《周易》之《离》。”象数易学集大成者虞翻也擅长“依易设象,以占吉凶”^[10](《三国志·虞翻传》),曾言中关羽断头之日,孙权称其为“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10](《三国志·虞翻传》)孔融赞其为“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10](《三国志·虞翻传》)。不仅如此,其易学研究中还使用了神学的资料。如京房用筮法注经,现存的《京氏易传》,即是其例。《易纬》是解说、阐发《周易》之作,其中大讲灾异、感应、符瑞等思想,是用神学诠释《周易》的典范,东汉郑玄等多援引《易纬》注《易》,因此,两汉象数易学作为一种思想是与神学交织在一起、具有一定实用性的学说,而作为一种注《易》工具,通过训释与经文混为一体,使易学研究透出神秘色彩。象数易学具有神学特征极大地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求,对于调整封建社会的秩序、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有进步意义。而就其易学自身发展言之,它是与思维的提高、科学发展背道而驰的。

参考文献:

-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8.
- [3]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3.经部·易类·易汉学提要.
- [4]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7]永瑛.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8]杭辛斋.学易笔谈[M].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6.
- [9]王弼.周易略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10]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责任编辑:王 萍)